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 国家文化安全

MAKESI ZHUYI YISHI XINGTAI YU GUOJIA WENHUA ANQUAN

曲士英 牛涛 陈宏伟 著



工商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 国家文化安全

MAKESI ZHUYI YISHI XINGTAI YU GUOJIA WENHUA ANQUAN



曲士英 牛涛 陈宏伟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文化安全 / 曲士英, 牛涛, 陈宏伟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78-0235-8

I. ①马… II. ①曲… ②牛… ③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②文化—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A811.63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620 号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文化安全

曲士英 牛涛 陈宏伟 著

责任编辑 何海峰 刘 韵

责任校对 何小玲

封面设计 许寅华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14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0235-8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8

前言

PERFACE

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文化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文化从来都不是纯粹语言、文学和艺术表现形式意义上的存在,其多样化的形式背后内在地蕴含着相应的国家和民族在特定社会阶段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内容起到统领和引导的作用。文化传播和内化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在蕴含共同价值观的一定文化环境中,民族的全体成员逐步达到情感、观念、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相互认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国家的全体成员进一步对共同利益、社会理想、共同目标等进行选择,逐渐形成多数人认可的政治理念,形成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凝聚力。在这里,文化和意识形态都起到了形成民族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的凝聚功能。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间在总体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逐步分化出不同的利益取向、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这就需要强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凝聚社会成员的功能,通过对社会共同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去引导国民认同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在当代中国,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想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真心接受,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光靠理论的灌输不行,必须将其蕴含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各种文化形式中,让人民群众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文化走向,影响着国家文化秩序的变动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由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信息传播的自由交流,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的语言环境下正在失去原有的空间,国家的文化边界正在逐渐消除,国家的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就目前的全球化态势来看,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表现为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和冲击。

由于各国之间这种实力及所处地位的不均衡和部分国家的文化霸权意识,部分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凭借其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利用其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努力推进其强势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大力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试图以此来同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的价值观念,消解其民族意识,最终成为它们的附庸,从而实现它们按照自己意愿和价值取向去建构和统摄世界的战略构想。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曾指出:“一代人之后,我们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价值观念交流的好坏要比我们进行军事外交优势的影响更大。”面对这种跟随全球化而来的文化扩张、渗透、控制和强行推入,作为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必须意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还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需要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全球化体系的积极成员,中国需要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作为与西方大不相同的独立文明形态,我国文化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霸权冲击,需要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双重影响,需要对其进行扬弃,继承和发展其中优秀的内容;作为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大国,利益分化和社会多元化带来文化的多元趋势,需要主导性文化统领。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的复兴对现有世界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我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存在根本的差异,甚至是对立。因此,西方国家特别重视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企图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摧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峙。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方面与西方有着根本性差异的中国,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此来充实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和感召力,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道德制高点。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价值体系,在国际上也很难得到全面的尊重和安全。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造成的利益格局调整 and 分化以及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必然深刻影响人们的意识,引起社会成员间政治、文化上的分化和冲突,而这些矛盾最终会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浮现出各种思想流派和学说观点,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意识形态冲突的过程中,

要想保持和重建社会的凝聚力,同样需要确立一个由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所统领和指导的思想文化体系,以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提升民族凝聚力、确保文化安全,关系重大。

我们可以将国家层面的文化安全分为两个方面:国内文化安全和对外文化安全。国内文化安全侧重于文化对内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巩固本国国民的精神、道德、伦理和政治信念,遏制道德失衡和信仰危机;对外文化安全侧重于文化对外的抵抗力和融合力,在勇于开放交流、大胆融合其他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有效抵御那些不适于本国国情的内容对本国传统文化、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侵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文化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均是对人类经验生活的表现形式,区别在于前者是一般表现形式,而后者是特殊表现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精神文化体系,作为文化理性抽象的结果,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的本质,支配和规范着文化的核心内容和表现形式。作为文化主体的社会个体,成长于既定意识形态的环境中,通过各种文化的形式和教育的路径形成对既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文化意义上的人实质上也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人,而意识形态实质上也是现实的人的文化,文化是意识形态加以选择、改造和认同的产物。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文化能够协助意识形态实现从总体上持续控制社会秩序和既定利益关系的要求,能够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持久地实现意识形态的支配功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想实现文化安全,必须了解本国意识形态,巩固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的统领和引导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认识现实世界的思维和行为范式,一种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符合中国国情,能够鼓舞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有效整合社会,对于转型期多元分化的中国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来探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不仅有助于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民族传统和信仰,也对保证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虽然强调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封闭保守。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文化若想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推进民族、国家的社会进步,必须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具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必须参与到世界的现代化、全球化当中去,需要通过对外传播和交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价值体系,争取世界的认可,吸取其他国家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来发展自己。因此,应站在更高的层面,以更宽广的视野,将对我国文化安全的维护看成是建设一种各种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只有在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与建设的同时弘扬我们本民

族的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能独立存在,与其他文化能和谐相处,并体现出其独特的作用和存在意义,才是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中华民族文化一直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文化形式根植于本民族的社会基础之上,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断发展变化,其发展历程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恰恰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表现。我们应立足于民族传统,吸收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将外来文化内化为本民族的东西,为己所用,使中国的文化既融入世界主流又不湮没于世界之中。

具体来说,首先,本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基本观点、产生和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明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充实文化建设内容,明确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也有助于我们以文化创新更好地传播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其次,本书从结构学和动力学两个层面分别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将文化安全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战略放在当前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整体战略的整体视域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能够从整体意义上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战略。

再次,本书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与国家文化安全攸关的意识形态挑战的各项因素进行了分类剖析,如网络发展、西方国家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霸权和扩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等,有助于我们从国际国内关系的互动中系统认识我国文化安全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及其原因。

此外,本书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精神信仰、价值追求、文化认同、理想信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从理论思潮和公众思潮两个角度思考我国社会转型中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背离,探索时代变迁对理论创新的要求,有助于我们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中系统认识我国文化安全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内部结构性挑战及其原因。

最后,意识形态需要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才能取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这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象化,使意识形态宣传的语言生动活泼、形式丰富多彩。本书最后从文化发展的维度思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战略,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文化创新和国家软实力三个层面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

作 者

2013 年 12 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00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	002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	023
第四节 主要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024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	027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相关概念	027
第二节 意识形态理论	033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	047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	051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	059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的结构学分析	059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的动力学分析	064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及面临的挑战	06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	069
第二节 新时期文化建设背景下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078
第三节 基于中国文化消费的国家文化安全维护	093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文化	100
第一节 文化发展的理论立场	100
第二节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10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体现·····	107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抵御外来文化渗透的根本保障·····	110
第五节	文化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作用·····	114
第六章	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120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121
第二节	核心价值战略方针·····	128
第三节	国家核心价值战略的具体部署·····	137
结 语	·····	158
参考文献	·····	160
后 记	·····	16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社会制度、核心价值体系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①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新的目标迈进,文化的作用更加广泛而深刻。从国际看,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现,许多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都把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对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体上讲,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安全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2年第1期,第4页。

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入、全面和多角度的研究,全球化以及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扩张政策也开始被纳入研究的基本视域,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将文化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但西方学者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倾向性,要么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扩张和文化霸权战略进行辩护,要么为以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整合世界提供理论依据。而我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分散,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文化安全结合起来进行整体分析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很欠缺。

本书在对国家文化安全和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以及对当前我国文化产品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素调研的基础上,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关系,力图构建出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和根本路径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并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国家文化安全战略,这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

冷战结束前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由经济层面的交往和依存进一步上升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导力量的发达国家试图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优势,通过文化的主导与传播,以自己文化的价值取向去建构和统摄世界。这使得意识形态因素和文化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关于对文化安全思想、意识形态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下面将从历史的纵深发展和中西方横向研究的异同两个层面加以阐述。

一、文化安全研究的历史发展

(一) 中国历史上文化安全思想的演变

1. 古代正统文化安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源于《周易》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连用作为独立用词则始于汉代刘向《说苑·指武》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是“以文化之”的意思。西晋束皙在《补亡诗·由仪》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辑者,治理也,即通过文化发展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教化”而安天下的手段。这一思想滥觞于殷周之际,确立于先秦诸子,儒、墨、法各家在这一点上有趋同性,成为传统文化安全思想的主流。归纳起来,其主要主张是:

(1)文化安全的主导力量是统治集团。从西周开始,中国主流的文化安全思想主旨是自上而下,由统治者以身作则,实行教化,以实现社会和谐安定。《诗经·周颂》成于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间,已经将“文”与“武”对举,有“允文文王”^①和“思文后稷”^②的诗句,称赞周先王的文治。《尚书》的政治文告反复宣扬君王必须建立思想和行为标准,并率先垂范,以统一意志,固本安邦。《尚书·仲虺之诰》说:“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即君主的文德需要不断增进,天下才会归服;反之就会分崩离析。《洪范》要求“皇建其有极”,说“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君主要以自身的行动立下标准(“极”),民众必会归化君主的标准,并自愿共同遵守。孔子承续这一思想,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③,“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之,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④。认为统治者明定并遵守思想规范,是防止动乱,实现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前提条件。墨家的“尚同”思想在这一点上和儒家是一致的。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唯能壹国家之义,是以国治也”,“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⑤

(2)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文治优于武功,偃武修文是为政的优先选择。“偃武修文”出自《尚书·武成》:“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儒家区分王道与霸道,把以德服人和教化天下,作为保境安民的主要途径。对民众要以君子之道熏陶感化,不能凭借刑法暴力,做到“不怒而民威于铁钺”^⑥。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⑦所以,只有以文治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⑧

(3)文化安全的基础是坚持正统思想规范。确立、维护、灌输、宣导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思想规范,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保障社会的齐一性、和谐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心目中的文化安全。

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以礼的规范作为行为准则,把“克己复礼”

① 《诗·周颂·武》,四部丛刊景宋本。

② 《诗·周颂·思文》,四部丛刊景宋本。

③ 《论语·为政》,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

④ 《论语·季氏》,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

⑤ 《墨子·尚同》,明正统道藏本。

⑥ 《中庸疏略》,清康熙刻本。

⑦⑧ 《孟子·公孙丑》,四部丛刊景宋大字本。

作为实现社会安全的纲领,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问题在于不仅要知仁,而且要真正以严肃的态度行仁,并落实到礼法上,整个社会才会井然有序、和谐安宁。“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①所以,在宏观上,要坚持正统文化方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②恶质文化足以造成动乱,危及国家安全。在微观上,民众如违仁悖礼,同样是社会动乱的根苗:“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③荀子更是特别强调必须建立正确而统一的价值标准,这就是礼义规范,否则就会造成交往失序、结构错位,导致天下大乱。荀子认为,有三种失范,他称之为三“祲”:一是“政险失民”,二是“政令不明”,三是“礼义不修”。结果是“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④,国家安全将荡然无存。

此后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封建王朝基本上延续了上述文化安全思想,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合理的成分,是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安全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源。

2. 近代反传统文化安全思想的兴起

明代中叶,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没落,论者认为,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19世纪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文化安全思想也发生了深刻转变,主要表现是对三重矛盾关系的破解。

(1)文化安全与变革求新的关系。近代学者质疑祖宗成法和传统思想是社会安定的基础,认识到国家安全的保证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改变旧的文化规范,打破传统,大胆改革。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热烈倡导文化变革论,认为必须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制定新的认识 and 行为规范,否认永恒不变的“正统”,主张不变则乱,变而求治。王夫之说:“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⑤认为“正统”没有什么固有的根据。他进而提出:“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⑥因为,人可以积极地随时而动,因势利导,以正确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大治:“天之所乱犹将治之。裁之于天下,正之于己,虽乱不与俱流;立之于己,施之于天下,则凶人戢其暴,诈人敛其奸,顽人砭其愚,即欲乱天下,而天下犹不乱也。”^⑦19世纪以后,随着

① 《论语·卫灵公》,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

② 《论语·阳货》,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

③ 《论语·泰伯》,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

④ 《荀子·天论》,清抱经堂丛书本。

⑤⑥ 《读通鉴论·叙论一》,清船山遗书本。

⑦ 《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清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

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王朝的衰亡,国事蜩螗,变革旧文化的要求渐成共识,人们认识到,只有破坏老传统,打破禁锢,才能救国保种,否则就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可言。梁启超指出,破坏旧文化,是铲除动乱的根苗,是引导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旧制度深藏扰乱的种子,所谓“辑和万民”,其实是“苟安”：“扰乱之种子不除,则蝉联往复之破坏,终不可得免。”而变革的首要一步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亦即从文化思想的变革入手,“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①。

(2)文化安全与唤起民众的关系。传统思想认为治乱之道取决于统治阶层,首先是君主。治乱之本,在于人心,必须自下而上,使国民普遍接受新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实现文化认同和整合,才能达到天下大治。黄宗羲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②因而他主张通过自由争论(“清议”)形成“公是”,通过舆论的一致,实现统一和安定,所以说:“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专一也。”^③顾炎武也认为,治乱的关键在于普遍的文化观念,一切“自正风俗始”,就是说治乱立足于匹夫的心理行为:“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④鸦片战争之后,在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艰难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天下兴亡取决于人心向背,所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用先进的文化改变国民意识,非此无以固国本。此时的文化安全论转向以国民教育为中心。严复认为,当时中国最可怕的事情是民众的愚昧,“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所以他大声疾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⑤梁启超更进一步提出“新民”的口号,并且明确主张新民要从文化入手:“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源。”^⑥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更加认识到救国图强的根本在于民众的觉醒。他说:“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求逞,军阀亦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服者。”^⑦所以,他提出了“唤起民众”的革命纲领。

① 梁启超:《新民说》,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50—151页。

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清指海本。

③ 黄宗羲:《汰存录》,清傅氏长恩阁钞本。

④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清扫叶山房石印本。

⑤ 严复:《原强》,转引自高惠群、乌传袞:《翻译家严复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⑥ 梁启超:《新民说》,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123页。

⑦ 孙中山:《宣言》,转引自胡绳:《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4页。

(3)文化安全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有明一代,西方传教士把近代部分西方文化带入中国,打开了中西文化会通和碰撞的闸门。传统文化代表人物对此的反应是负面的。他们从“夷夏大防”的儒家正统观念出发,认为外来文化侵害了中土思想的纯正性,蛊惑人心,动摇国基。万历时礼部侍郎沈淮上疏说:“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他的同僚晏文辉则说:“自伏羲以迄周孔,传心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无容以异说参矣。”^①虽然当时也有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开明人士,主张“铎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即尊制同文,合之双美”^②,倡导中西文化会通融合,但主流思想始终视西学为洪水猛兽,就连有识之士如方以智等人,顶多也只是认为西人长于“质测”,“以巧密见长”而已。这种思路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洋务运动,演绎而为“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直到19世纪末,改革与革命思潮兴起,学界才开始重新反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严复在选择介绍西方重要文化典籍的时候,深刻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别,正面评价了西方思想的长处,认为这些新观念恰好是破除中国旧文化积弊的锐利武器。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夸多识,而西人重新知。”^③他认为西方文化不但不是威胁中国安全的祸水,反而是救国的良药,只有借此济世之方,鼓舞民心,破除积弊,才能找到“以强以富之机”,保国保种,免蹈印度、波兰之覆辙。随着《天演论》等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在比较中西文化中探索中国新文化之路,蔚然成风。梁启超说:“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④

(二)西方历史上文化安全思想的演变

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安全思想一样,西方学术史上并没有把文化安全作为专门的主题,甚至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文化安全概念。但是,从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角度维护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和稳定的问题,却受到普遍的关注。应当说,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当代文化安全理论的前史。

1. 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文化安全思想

古代希腊的政治安全思想明显地分为两大导向,即柏拉图的贵族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平民主义。柏拉图《理想国》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确保国家的安定统一,防止动荡和分裂。他认为,只要上层团结,下层阶级的冲突和对立都不足为虑,为

① 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156页。

② 徐光启:《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7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

④ 梁启超:《新民说》,《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

此必须保持上层的文化同一性。柏拉图据此设计了国家模式：“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合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①有这样的统治者，使公民的整个精神和道德生活都处于严格的控制和监视之下，使整个国家变成类似宗教社团的组织，宗教、艺术、科学都成了和谐一致的整体，社会实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就把不安全的种子从根上铲除了。

亚里士多德的文化安全观与柏拉图形成对立的两极，是与城邦的直接民主制相关的。“主权在民”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理念的核心。他说：“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总是最后的决断具有最高权威。”^②按这种观点，社会安全的基础在于每个人按其自然属性行使公民的权利，城邦的动荡和紊乱是邪恶、狂妄、贪婪的罪恶意念引发的，因此要按自然本来的秩序构建一种自我调节的理性精神。因此和谐的根据不在于某个杰出人物的明智引领，而在于大家为良好生活达成共识。麦金太尔(A. MacIntyre)在《美德之后》^③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的说明。

与此相反，柏拉图否认公众有天然的正义共识，因为普通人是“为当下之乐而活”，因而认为发散的文化理念无助于城邦的稳定和安全。《国家篇》特别强调指出，在民主政体下，煽动家投合公众的嗜欲，造成思想混乱，民主走向寡头政治的反面。他主张城邦的性格取决于统治者的性格，要实行思想一律，统一文化理念，为此要实行统一的教育制度；由于城邦的安全取决于精英的团结一致，因此必须对作为看守者的卫士进行正义理念的灌输，甚至要求议事厅对公民思想进行严格控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化与城邦安全的不同观点，巴克(Ernest Barker)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④这部名著中，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这时起，自由民主和专制集权哪一种政治制度更有利国家的安全稳定，就成为西方政治学中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一分歧在中世纪的政治学中是以神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奉行柏拉图的思想路线，强调统一意志。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面对双重挑战：一方面来自有基督教历史传统的异教；另一方面来自偏离基督教信条的世俗皇权。奥古斯丁提出“上帝之城”和“魔鬼之城”的对立，要求君主和公众同样自制欲念，遵守神的法则；国家有义务强制推行基督教，建立宗教秩序维护安定；公众

①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14 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99 页。

③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④ Ernest Barke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Plato and Aristotle*, General Books, 2009.

则有义务服从国家,除非它违反神的法则。因此国家安全的最高原则是在基督教义基础上的文化统一。^①到了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路线,把自然目的论嵌入上帝的律法中,认为不仅要服从于符合上帝命令的法律和抵制不义之法,同时还要从自己的良知出发服从那些确保世俗安定的法律,条件是安定和秩序符合人的自然属性。这样,自由与必然就统一起来了。这就是说,国家安全并不违背人的自由意志。^②

2. 近代西方的文化安全思想

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启蒙思想成了反封建斗争的先导。革命既要求打破传统社会的稳态结构,又要求稳定新形成的社会秩序。在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实现社会的平衡和安定,是历史性的新课题。启蒙思想家探求新的文化理想,认为消除社会的分裂、动乱,实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必须有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在启蒙思想高扬的18世纪,取得共识的政治理论总是要透过过去与当前的社会表象,找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常数,而这个常数就是正确、永恒、普遍的人性。自由代替奴役,平等代替压迫,博爱代替偏私,理性代替迷信,历史的变数都是表面的,天赋人权即自然法权才是本质。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据此提出,依据社会契约,政治共同体制定并自愿选择一套公共价值体系,供所有成员遵守,这就是普遍意志,于是,社会纵有持异见的少数派,也可以通过说服并晓之以理、动之以利使其自愿服从普遍意志。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上的思想统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基础。但是,社会契约所形成的普遍意志必然与个人自由发生矛盾,这实质上是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的关系问题。洛克认为,人们根据社会契约创造了政府权力,以保障自己免受他人之害,但这是付出个人自由换取的安全保障,安全成了需要额外付出成本的东西,所以政府是受托人。这就是说,社会优于国家,公众的思考形成的意见,作为社会的普遍思想文化导向,决定了对国家行使安全保障能力的评价,也决定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选择。^③卢梭的观点与此相近。由于人人追求自利的自然状态和自由造成社会失稳,危及个人的安全,因此必须停止对消极自由的追求,而是实行自我强制的积极自由。社会契约使人第一次有机会选择他们“应该”遵循的价值体系。这种文化安全论把民主自由与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思想统一起来了,其基础是公众普遍认

^① H. A. Dean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St. August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② Etienne Gilson: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t. Thomas Aquina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4.

^③ 洛克的文化安全理论可参看塞里格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学》, M. Seliger: *The Liberal Politics of John Locke*, L. Allen & Unwin, 1968.